

法治的社会生成*

——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结构的法治意涵

孙亮亮

(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法治作为中国发展进程中的政治诉求,其核心是对权力的规范与制约和对权利的尊重与保护,这个核心恰好切中了中国传统的权力本位、权利缺位的硬伤。但要真正建成法治国家,认真探索法治赖以生成的社会基础实属必然,故而近年来从社会结构等对市民社会与法治的关系的讨论渐趋入。拟探讨市民社会的培育与成熟对法治的深层作用,进而对中国走向法治的过程中建构作为法治的深层社会基础的中国市民社会的路径选择作一浅析。

关键词:国家;市民社会;法治;权利;权力

中图分类号:D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07)01-0042-06

法律制定者如果对那些会促成非正式合作的社会条件缺乏眼力,他们就可能造就一个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世界。

一、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理论流变与结构变迁

“理论的逻辑行程以现实社会的变化为最终依归”^{〔1〕}。对于中国学界来说,“市民社会”一语作为西学东渐过程中的舶来品之所以能激起如此广泛的学术兴趣,归根到底是市场化改革所造就的社会现实和基于此种现实的法治诉求。而“市民社会”作为西方社会的本土语词,对它的缘起的讨论可能就要“言必称希腊了”。“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几乎可以发现此后所有的观点的胚胎、萌芽”^{〔2〕}。

古希腊傍海而居、城邦林立,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生存方式孕育出了城邦民主政治、海洋商业文明和公民理性文化。经过雅典执政官伯里克利的改革,雅典的民主水平可谓一枝独秀,傲然于世,从而成为希腊文化的核心地带。对于希腊的社会现实,伯里克利、亚里士多德都进行过经典论述。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生而是政治的动物,“对全体希腊人来说,城邦就是一种共同生活”^{〔3〕}。城

邦的宪法是一种生活模式,而不是一种法律结构”^{〔3〕}。在古希腊“市民社会”一词就被亚里士多德等同于城邦,其潜在内涵是区别于家庭私人生活的公共政治生活,这种公共政治生活使家庭私人生活都依附于城邦,形成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复合体。所以伯里克利就说:“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所关心的,不仅是他自己的事务,而且还关心国家的事务——这是我们的特点: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不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4〕}。可见在古希腊,个人的生活和价值均依附于城邦共同体,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复合,在这种情况下,要他们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区分开来是难以理解的。

到了古罗马,西塞罗认为市民社会“不仅指单个国家而且指也依法达到出现城市的文明共同体的状况。”^{〔5〕}这些共同体有自己的法典,有一定成的礼仪和都市特性(野蛮人和前城市文化不属于市民社会),市民合作及依民法生活并受其调整、以及城市生活和商业艺术的优雅情致。

中世纪往往被认为是黎明前的漫漫长夜,超验扼杀世俗、神权否定人权、教皇代替君主、教会

* 收稿日期:2006-10-25

作者简介:孙亮亮(1982-),男,甘肃庆阳人,西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理学、宪政理论。
万方数据

君临国家、神学包容科学,在这样一个时代,等级身份和神权原则主导一切,市民社会作为一个实体被神权国家所吞没。随着欧洲商品经济的发展,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一次比一次更加深刻地冲击着罗马教廷的权威,这个过程就是神性与神权淡出,人性与人权的复苏的过程。近代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革命终于星火燎原,风起云涌,以破竹之势席卷欧洲和北美,在近代历史的神经地带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到此,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分离才成定局,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立与对立才催生了近代的法治潮流。在近代思想史上,黑格尔与马克思可谓对近代市民社会理论的创立与发展做出贡献的两大思想巨人。黑格尔第一次将市民社会作为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概念进行了科学界定。他指出“市民社会是外在于家庭和国家的差别阶段”,但市民社会是一个不能自足的领域,常常由于利益的差别与冲突而陷入战争状态,因此就必须诉诸于一个处在但却是最高的公共机构,即国家。在黑格尔看来,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是伦理观念发展的三个阶段,家庭是“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精神和狭窄的普遍性的领域”,国家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国家是客观精神发展的顶点和最高体现,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东西”^[6]。可见,黑格尔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确实界分了国家与市民社会,根据他的理论,我们可以将市民社会界定为“由私人生活领域及外部保障构成的整体”^[7]。黑格尔家庭、市民社会 and 国家的伦理序列事实上是其辩证法正、反、合在法学研究中的运用,合的完满性最终导致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基础上的国家至上性,国家高于市民社会是其明显的理论架构^[8]。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最大特点在于把黑格尔颠倒了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颠倒了过来,指出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原动力,市民社会先于或高于政治国家而存在。“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组成部分,是意志所具有的现实精神实在性,他们是国家的存在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他们才是原动力。”^[9]市民社会是从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出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上层观念的基础。^[10]由此可见,所谓市民社会主要是指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摆脱了封建的政治、伦理、道德和宗教等束缚及人身依附关系,按照市场原

万方数据

则能独立自主地进行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市民”个体所构成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组合,他们体现着市场条件下独立自主的个人(“市民”)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主要是经济关系,特别是财产关系)^[11]。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黑格尔,其共同之处就在于把社会结构二元化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区别在于前者与后者的层次关系的不同架构。市民社会理论的兴起与发展根源于商品经济或曰市场经济的发展,思想启蒙运动以来的种种社会契约理论到黑格尔与马克思是总结,而这种对社会理论的认识的深入的直接动因是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革命。正是从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革命开始,西方才逐渐实现了法治,而法治的核心已被公认为政府权力的正确行使和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限权政府和法律至上是法治的基本精神,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保障市民社会作为一个独立和外在于政治国家的私域不受政治国家的侵犯,进而实现在公权力权威保障下的自律和理性自觉的个人权利的实现和满足,这是近代西方社会演变的核心价值诉求与最终发展目标。

二、市民社会的结构—功能分析——法治的深层社会根基

对于法治,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的定义厘定了其后西方哲学家、政治学家和法学家关于法治的理论框架,后世学者的法治理论实际上是对这一“已制定的法获得普遍的服从,而被普遍服从的法律本身又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的“普遍服从”与“良法之治”的法治概念的注释与拓展而已。从希腊圣哲到启蒙巨将再到现代学者,无论其法治理论多么纷繁复杂,但归结起来,可以用1959年在印度召开的“国际法学家的大会”上通过的《德里宣言》所列举三条原则概括:一是立法机关的职能在于创设和维护使每个人保持“人类尊严”的各种条件;二是不仅要为制止行政权的滥用提供法律保障,而且要使政府能有效地维护法律秩序,借以保证人们能有充分的社会机会和生活条件;三是司法独立和律师自由是实施法治原则不可缺少的条件^[12]。之所以认为市民社会是法治的深层社会根基,原因在于市民社会特有的结构—功能对上述法治原则的决定性支撑,只有把上述原则真正立于市民社会的沃土上,法治的象牙塔才会傲然屹立,人类安居乐业

所必需的正义、秩序、自由、平等、安全才能惠及众生,传之久远。西方法治的建立与市民社会的形成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正是近代市民社会的兴起,才使法治具备了所必需的社会土壤而确立。市民社会的基础性作用正是通过其结构一功能才表现出来,而恰恰是这种结构一功能对法治原则的契合与回应才使它具备了对法治生成的基础性作用。

(一)市民社会是良法生成的社会土壤

亚里士多德虽然提出了“良法”的概念,但是“良法”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标准,亚里士多德却没有深入论说。“良法”作为法治的制度前提和价值追求,在西方法学史上争议颇大。与良法对应的恶法是不是法,从古至今,自然法学派和实证法学派争论不止。如果恶法非法,那我们理应追求良法,如果恶法亦法,那么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必然也要发现恶法的根源,而不是任凭恶法横行于世和善恶不分。所以归根到底,法的善恶的讨论的最终价值趋向依然是尽可能制定出良法。良法本身作为一个价值词汇体现了人类对客体有用性的主体评价,指人类反思历史、审视现实和前瞻未来的价值底线对法治的应然期望,并使这种期望制度化为实现规范的理性行动。

反思人类文明史,我们完全可以说,良法的首要含义就是要对人作为人的尊严的肯定与保护;其次,体现对已有文明的延续性和对未来生活的前瞻性,尤其要符合现实社会的实际运行逻辑。只有延续历史,才能防止制度断层所带来的法律良性运行环境的缺失;只有前瞻未来,才能杜绝朝令夕改所导致的对法律运作的心理预期的落空,而这两者,都离不开对现实的审思与明辨。如果说对历史的继承体现了法的自然演进而可以称作经验理性,那么对现实的把握和对未来的预测则要跨越地域与民族作鉴别与比较,是建构理性。“人类切不断历史,也离不开逻辑,对前者的尊重,构成经验主义的理想追求。前者是长度,积累人类历史之渊源,后者是宽度,测量人类自由意志的极限。前者是纵向积累,后者是横向扩展。没有前者,即没有时间,没有后者,即失落空间,人类若要向三维——高度飞越,进入三维空间,必须经验历史与先验逻辑的共同扶持。”^[13]再次,良法要在体系上和谐统一,在逻辑上严密周全。一部真正优秀的法律,不仅要实现内涵层次的精神升华,还要符合形式层次的美学要求。

法治社会的良法是由市民社会建构起来的。从表而上看,法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然而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之间的张力却是客观存在的,人类不可能对社会秩序的形成与演进有完全的、透彻的了解,法治社会的法律一方面是市民社会各利益集团及公民代表在社会资源分配中达成的协议,市民社会的利益的异质化导致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市民社会并不希望也不可能通过减少多样性压制冲突而谋求同相一致的道路。“相反”市民社会要接受利益和理想的多样性。它允许个人或机构追求多样化的目标,但并不允许不择手段地追求这些目标,而是对冲突进行合理的控制来达到市民认同、社会整合和理性规则秩序。^[14]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是将运行在市民社会的规则通过立法机关赋予法律形式予以认可。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不能反映有效运行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的规则、规章,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只是反映少数人的需求,那么法本身就失去了市民社会认同的合法性,因而不可能被普遍遵守,而只能依靠暴力维持,结果就不会有真正的法治。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是被发现的,而非被创造出来的。

所以,良法是在市民社会的沃土中生长出来的。离开了市民社会多元权利的冲突与整合,不可能有真正具备社会根基与社会认同的良法。市民社会是孕育良法的社会土壤。

(二)市民社会是权利制约权力的社会机制

众所周知,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所以,它具有某种先天的穿透力与破坏性。如果不对它保持刻意的警醒与足够的约束,因为权力的滥用与膨胀对法治理念的消解就不可避免。同时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权力能够方便地为掌握这一资源的人带来其他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权力之所以诱人,最主要的应当是经济利益。”“如果没有经济利益可得,权力也就没有多大意义。”^[15]因此,权力本身就有走向腐败的倾向,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孟德斯鸠说得对:“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运用权力直到遇到界限才停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权力的滥用,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16]孟德斯鸠只注意到权力体系内部的分工

与制衡的重要性,却忽略了权利制约权力和权力制约权力的重要意义。而市民社会作为权利的集合与权力的源泉,对法治的制度性反思便无法脱离市民社会的规范架构。正是由于市民社会本身所具有的与其与政治国家的界分作用,才使得对权力的制约可以从权力外部加以分析。

首先,历史已经昭示我们,在一种非政治化的市场经济制度下,绝大多数的经济资源由非官方的企业所支配和组合。私人企业、私有财产制度、各种利益组织构成市民社会的基础,同时也是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体。这种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制度解构了传统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经济生活单一化、利益主体同质化的局面,取而代之的是政治生活被排除在经济生活之外,形成了经济生活多元化、经济利益特殊化、利益主体异质化的局面。在这种多元化的经济生活中,由于私有产权制度被普遍认为是经济生活的基本法则,国家要加以保护,是私有财产的“守夜人”,社会个体也普遍加以捍卫。这样,作为利益主体的社会个体和社会集团从经济上获得了生存的独立性。经济上的独立必然导致社会生活的自主性。在这种经济生活多元化的社会里,社会个体利益的自主性和排他性导致利益主体异质化。为了求得自身利益的满足,这些彼此具有排他性的利益主体不得不通过契约结成利益集团或合作组织,从而使这些异质性的利益主体之间形成一种包含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契约型人际关系纽带。这种契约型人际关系纽带起到利益交换和功能互补作用。民主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制衡、公意表决、以利益集团为后盾的各种讨价还价的利益平衡、妥协和各种民主法制和秩序,只不过是这种契约型人际关系和法则在政治层面的制度化表现而已。

其次,市民社会各种社会组织多元化、自主化发展,形成了对国家权力的制衡与分割。“在传统社会中,财产和人格是重要的权力源,而近代市民社会兴起后,组织则成为异军突起的权力源”,并“进而形成一种抑制权力的多元社会权力结构”^[14]。社会组织是这一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14]社会组织,如自愿组织、学校、家庭、教会、沙龙等自愿性组织,如政党、压力集团、利益集团、大众传媒等政治性组织,如企业、公司、产业联合会、工业或企业家协会等经济性组织是横亘于个人和国家之间的中坚力量。组织多元化无疑构筑了一个以权力分离和制衡为标志的多元政治体

万方数据

制,提供了能有效保护私人权利、抑制等级体系和权力支配的互控机制。“它一方面使统治资源分散化而加大统治者垂直统治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微势团体进行资源联合,加大统治者意欲控制的成本。”^[14]这种机制使集权增长受到了遏制,使社会自主权利得到扩展,从而抵消国家权力的强制性控制,保障市民社会的自由和权力。

再次,个人享有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形成对国家集权的社会消解。从英国的《权利法案》到美国的《独立宣言》再到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都贯彻了自由主义精神和天赋人权思想。市民社会成员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得到了充分的确认和肯定,其自由和权利的保障随即成为政府的目的。这在社会契约理论中已被许多思想家多次论述。人们订约转让一部分或全部的权利缔结政府的唯一目的就是保护缔约人的上述天赋人权免受自然状态下的侵犯,国家的真正合法基础在于市民社会,在于其对权利的尊重与保护。虽然西方资本主义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从“个人主义”趋向“集体主义”,从“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但是“西方民主概念的主要支柱是一种多元社会,它把利益的异质性展示并表达了出来。”^[17]“因此,在市民社会成员自由、个人权利对国家权力分解这一点上,仍然没有实质的改变。”^[14]

(三)市民社会是普遍守法的制度环境

法律受到尊重并得到社会的普遍遵守是法治社会的一项基本要求。在近现代民主社会中,由于论证并实现了公共权力尤其是立法权的社会来源,即通过普选与代议的方式制定的法律成为社会与人民的公意,从而也就为守法创造了制度前提。前已述及,市民社会是产生法治社会的“良法”的土壤。正因为这一点,普遍守法不仅有制度前提,还具有牢固的社会心理基础。市民社会使得对法的认同与尊重建立在多元权利与殊别利益的并存、冲突与整合之上而具备了社会根基,于是,守法意识也就内化为社会成员——公民的价值体认,并外化为守法的践履行动。

三、型构中国的市民社会——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对人类民主宪政和法治产生的历史加以考察不难发现,如果没有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欧洲市民社会的兴起及其与国家的分离,就没有新兴欧

洲资产阶级 就不会有市民社会的革命 就没有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宪政与法治。同样在我国 ,如果没有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以自治、自律为组织原则的市民社会的形成 ,也就不可能建成现代法治国家。

然而 ,我们也面临诸多困难。

第一 ,长期以来的封建集权统治和计划经济体制 ,导致国家吞并社会 ,使社会高度政治化 ,公共权力成为维系社会的核心 ,个体生存严重依附于权力 ,并形成了特有的“官本位”文化。从而导致的政治权力崇拜、权利意识缺位、人治情结严重和社会结构单一的弊病 ,致使法治所需要的社会结构多元化、权力运用社会化、权利意识本位化难以实现。

第二 ,乡土社会的存在使民主、自由、平等价值理念难以建立和普及 ,使得公民意识的培养和民主政治的推进面临诸多困难。

第三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严重对立使得城乡之间壁垒重重、缺乏流动 ,这与市民社会开放、统一、平等的价值理念严重背离 ,难以形成统一的市民话语体系 ,也因此难以起到市民社会应有的作用。

面对上述困难 ,我们要型构中国社会的法治的基础——市民社会 ,应当说已经没有走欧洲市民社会自然演进的道路的国情现实与时代环境。因此在型构市民社会的过程中 ,必须走政府主导的、以健全市场经济为核心的道路 ,唯有如此 ,才能在市民社会培育与法治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既使市场经济体制尽快建立 ,又防止社会转型时期的动荡与无存 ,既在经济体制转轨的条件下催生市民社会 ,又可以使市民社会在国家的建构理性的指导下健康成长。

首先 ,国家主导 ,法制先行。从时代条件看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 ,经济关系空前复杂 ,社会问题日益增多 ,行政职能渐趋强势 ,世界各国逐步一体。中国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民主与法治的建设不可能离开这个大的时代背景 ,所以国家对社会的干预越来越多但又必须在法制的框架下运行。作为后发外生型的法制现代化国家 ,中国面临转型时间紧迫、法治资源缺乏的压力 ,但又有政治资源强大、政府体系统一、社会威望较高的优势 ,所以建构市民社会由国家主导是必然选择。“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外生型国家 ,中国必须做出相当程度的社会结构调整 ,以容纳和推进现代化

发展。而这种调整主要是由国家力量实现的。^[18]毫无疑问 ,中国的改革既有自主需求的一面为其内在驱动的基础 ,但同时无可否认的是 ,国家是其重要的直接推动者。在中国 ,国家和各级政府从一开始就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去影响、改变传统社会制度 ,这种制度转型的一个根本特征 ,即使国家在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

其次 ,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自然经济到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可以说 ,中国改革最明显的一条主线就是经济体制改革 ,而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趋势又是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今已有十余年 ,这十余年的市场化改革给中国带来的变化自然不必赘述 ,有目共睹。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不但培育到了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平等互惠的契约关系、自由独立的个性意识 ,而且重新界定了产权关系和社会资源以及个人财产的占有和分配原则 ,这些都是形成市民社会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 ,市场经济领域不仅是市民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 ,而且是市民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没有市场经济 ,就不可能有市民社会^[20]。

再次 ,打破城乡二元格局 ,引导良性城乡互动。在中国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封闭的领域 ,而以政治中心为特征的城市也通过这种途径封闭起来 ,城乡之间缺乏流动。打破城乡二元格局 ,引导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 ,是乡土社会获得转型的必然要求 ,因而在解构乡土社会的同时 ,必须促进城乡之间的融合与和谐。打破二元格局以破除乡土社会的结构、实现乡村城镇化再到城市化的转变、促进社会结构对外开放、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 ,而这一切 ,都能促进自由、民主的市民社会的成长。

最后 ,培育公民意识 ,塑造公民精神。“公民意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化进程中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产物 ,它呈现的是与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主体自由和理性自律的精神 ,因而是市民社会与国家互动的黏合剂。^[14]^[28]事实表明 ,公民意识通过其合理性意识、合法性意识和积极守法精神 ,不仅为国家与市民社会运作的法律框架、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冲突与整合提供着价值基础 ,也为法律制度 and 法治秩序提供着合法性认同和内化。因此 ,要建立法治国家 ,就要塑造公民意识 ,并使之成为

法治国家的意识形态,法治秩序才能建立起来。 不可能走单纯的自然演进之路,也不可能一味地行国家推进之途,而是要在国家主导的前提下发挥两条道路的互动作用,达到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双向构建与良性互动。

可以说,无论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社会结构的转型、公民意识的培育、法律制度的建构,均离不开国家的主导作用,这既有历史原因、时代背景,也有国情现实、政治资源,这一切决定了我们

参考文献：

[1] 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5: 238.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第四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87.

[3] [美] 萨拜因. 政治学说史[M]. 李山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33.

[4] 徐大同. 西方政治思想史[M]. 北京: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1: 21.

[5] 戴维·米勒, 韦农波·格丹诺.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 中国问题研究所编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0: 125.

[6]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1: 197.

[7] 何增科. 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J]. 中国社会科学, 1994 (5): 57-59.

[8] 张俊浩. 民法学原理[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288.

[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一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215.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第一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41-42.

[11] 王晶. 市民社会培育是实现法治的基础[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03 (2): 22-23.

[12] 王人博. 程燎原. 法治论[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9: 131.

[13] 朱学勤.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4: 135.

[14] 马长山. 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15]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61.

[16] [法]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上册)[M]. 张雁琛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8: 26.

[17] [美] L. 亨金. 权利的时代[M]. 信春鹰等译.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97: 4.

[18] 孙玉玮, 张善根. 法制现代化与社会基础之重构[J]. 政治与法律, 2004 (3): 30-34.

[19] 李路路. 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阶层相对关系的双重再生产[J]. 中国社会科学, 2001 (6): 105-118.

[20] 邓正来. 国家与社会[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8、17.

The Social Basis Of The Growth Of The Rule Of Law

——On the meaning of the dualistic system of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SUN Liang – liang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Department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Gansu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The market economic system is being established in China. The rule of law , which the academic circles appeal strongly , has been confirm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rule of law , the core of which is to restrict governmental power and protect civil rights , is the political target during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The restriction of official power and protection of civil rights show the disadvantag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olitics. To establish a country ruled by law , it's necessary to seek the social basis of the growth of the rule of law. So this essay emphasized on the affection of the growth of civil society , furthermore , seeking the appropriate way of cultivating civil society in China.

Keywords :state ; civil society ; the rule of law ; civil rights ; official power